

# 首创“协赈公所”的经元善

■ 樊艳美



经元善(1840—1903),原名高泉,字莲珊(后也作莲山),号居易子、居易居士,晚年号剑溪聋变,浙江上虞五驿乡(今驿亭镇)驿亭人。其父经纬是上海富商,乐善好施。经元善17岁时至沪经商,清同治四年(1865年)继承父业经营钱庄,并从事慈善事业,由此结识郑观应、谢家福等洋务企业活动家和社会名流。清光绪四年(1878),经元善首创协赈公所,组织、领导江浙沪绅商赈灾,持续十余年,募款数百万,受清廷嘉奖十余次。此外,他集资创办了经正书院和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,制定实施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。在经元善的一生中,其慈善实践广受时人赞誉。

款的赈灾方法,使贪污中饱之事难以发生。而且每月将收解款项逐笔登报公布,每次赈灾结束都刻印征信录,使人一目了然”。而当时的官捐局账目不清、贪污挪用成风,弊端甚多,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,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各界参与义赈的积极性。

## 兴办义学救国

在当时社会,有识之士都在探索救国之路。洋务运动在经历自强、求富两个阶段后,效果有限,维新运动正在酝酿之中。经元善以兴学育才、改造社会为自己的救国之路。1893年底,他集资在上海创办了“经正书院”,聘请梁启超、王敬安等新式知识分子任教,教授中西方知识,试图开拓培养洋务人才的新途径。经正书院是对近代新式教育方式的尝试。但至1898年夏,因经费困难,经正学院被合并于南洋公学。

1897年下半年,经元善又联合上海各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。他明确提出办女学以“翼中国自强”的方针,他希望通过兴女学,造就出有文化的新女性,从而改良母教。如果使儿童从小就能受到良好的母教,就可以为以后的学堂教育打下好的基础,就有可能培养出对社会有益的各类人才。他办女学的目的还在于提倡男女平等。当时人们还是以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等旧观念来进行对女子的教育,裹足之风依然很盛。经元善希望使女子通过学习,掌握充当医生、律师、教习的本领,从而在社会上立足。

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非常严密,办事人员分工细致,职责分明,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;招生对象及学生工作都有明确规定,有利于照章办事,严肃校纪。“这种严密有序的学校管理制度是旧式书院所无法比拟的,这是经元善学习西方学校教育的具体体现。”中国女学堂之设,和经正学堂一样,为时不长,于1900年因经元善出走澳门而停闭,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。它开了新式女子教育的风气,作了妇女解放的尝试,培养了第一批从事女子教育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女骨干分子,为之后的女子教育和解放树立了榜样,打下了基础。

1899年秋,经元善决定将经正书院重新开张。在朝廷维新变法的号召下,经元善带着“为贫民谋生计,即为国家渐图富强”的思想而行动的。因此,书院拟

“以改良农事,振兴工艺”,抵制洋货之挽回利权为宗旨。此时的经正书院,和当初的学堂相比,名称虽然依旧,但是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。所设课程既有策论、掌故、算数、舆图,又有西文、西学,齐全的学科设置大受社会和学者所欢迎。“该书院重开不久又因经元善出逃澳门而停办,但其独到的办学方法则为其他书院所继承”。

## 慈善之源

是什么原因让经元善投身于义赈和义学的慈善事业中呢?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:首先,受其父经纬的影响。经元善的父亲经纬(1804—1865),字庆桂,号芳洲,其“性勤、慎言笑”,诚信刚正,他按照这种为人处事的理念经商,最后成了上海滩一位“白手致富十多万金”的成功实业家。经纬发迹后,一跃成为上海钱业巨头,担任上海钱业公所首董要职。经纬成功之后走上了一条“疏财仗义,见善必为”的道路。1847年,他与上海士绅首倡“三堂”,即辅善堂、同仁堂、育婴堂,白任堂主,专门为老人、小孩、灾民做善事。“三堂”由经纬亲力亲为,潜心经营,经久不衰,救济贫困百姓不计其数。1848年,上海郊外灾民尸骨遍野,经纬主持的辅善堂兴办了掩埋遗骨的善事。1849年,上海大水成灾,经纬率先创设两所粥厂,救济灾民,还在上海南门外设局,代养灾童1800余名,“待岁熟均听领回”。1850年,江北发大水,经纬邀集同志收赎妇女,不使堕尘,有夫者资送还家。1863年,经纬60岁寿辰,他将亲友所送寿礼2000余金,捐给辅善堂并劝募殷富,共置荒田5000余亩,召佃户垦种,把收入作为同仁、辅善、育婴三堂的恒久经费。此外,经纬还创办了敬修义塾。他于1848年拨款在驿亭建立宗祠,并在祠旁构建房屋,设义塾,这就是驿亭镇小学雏形。1855年,经纬扩大义塾规模,在公祠后又建起5间楼房、7间平房,旁建三层六角塔奎星阁及船亭、回廊等,新辟敬修义塾(1915年改为敬修小学)。经纬另置田产300余亩,规定经氏子弟免费入学,经氏鳏寡孤独还可每月在义仓领取抚恤救济粮。经纬一生淡泊功名,乐善仗义,正直无私,这对经元善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其次,受到儒家、佛教思想的影响。经元善主导思想为儒家思想,深受儒家经典的影响,但他对其他学说并不排斥,他认为佛教、

道教在教育人多多行善方面,是殊途同归。因为有这个认识,所以他的思想并非封闭,对佛家因果报应之说是笃信不疑的,他劝人们不要为物欲所蔽,恢复良知,及时行善,求得好报。他38岁创办义赈时在神前祈祷,结果一直无子的他连生四子,这虽是巧合,却使经元善更加坚信报应之说,从善之心更加坚定。“他推己及人,在宣传义赈时,不断向人们灌输这种思想。而这又是极具诱惑力的,造成很好的宣传效果。他写的两篇文章:《金观察办赈获募记》《魏君积德延龄记》很集中体现了他的因果报应思想。”这也体现出了经元善从事义赈的某种心态。

经元善生活的时代主要是19世纪中后期,那个时代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,内忧外患层出不穷,清政府像一艘破旧的大船,逐渐驶向沉没。在如此动乱的时代里,经元善走过他人生的大部分春秋。纵观其一生,经元善的最有影响的事迹就是主持义赈和创办女学。面对河南奇灾,经元善和友人一起募捐救济豫灾,开办义赈。后又接着开办陕西和山西义赈。协赈公所成为上海缙商组织义赈的常设机构。它是当时国内设立的第一个民间义赈机构,对于团结各地义赈组织,扩大义赈规模,起到十分明显的效果。他所遵从的募、收、运、放

相分离,定点、定人、定款的赈灾方法,有效避免了贪污、挪用等弊端,有利于调动募捐者的积极性。经元善在儒家思想的熏陶教育下度过一生,儒家的修身之道、仁爱之心、积极入世的态度,对他价值观定位的影响甚大,中国一贯是儒释道三者并存,经元善不排斥其他思想,根据其言行可以看出,佛家的因果报应等思想,也起着重要的作用。他用自己久不得子,义赈后连得四子的现身说法,鼓励别人募捐,从中可看到佛教在当时的社会影响甚巨。面对外辱不断、内乱频仍,如何救国是当时每个有爱国之心的人士都会不断思考的难题。经元善所得出的结论是:教育是救国之道。于是他身体力行,主张并积极实践其教育救国理想。1893年底,他集资创办的经正书院,为的就是开拓培育洋务人才的新途径,它所开办的科目和教学方式,已经有了近代新式教育的端倪。1897年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学院,明确提出办女学以“翼中国自强”的方针,希望以此未提高女性素质,从而由高素质的母亲培育出中国高素质的改革家。虽然有局限之处,并且时间很短,但是开了新式女子教育的风气,作了妇女解放的尝试,而且女学的规章制度制定严密,办事人员分工细致,职责分明,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;招生对象及学生工作都有明确规定,有利于照章办事,严肃校纪。这种严密有序的学校管理制度是旧式书院所无法比拟的,这是经元善学习西方学校教育的具体体现,在当时成为仿效的榜样。(作者来自苏州大学社会学院)



1897年12月6日,经元善在张园安地第召开了有中外妇女参加的“裙钗大会”,商议创办经正女学的有关事宜

## 创办“协赈公所”

经元善17岁起即从其父经纬经商,后承袭父业,成为上海有名的绅商。“他从1878年首创协赈公所,联合苏州、杭州、宁波等地的绅商举办河南、陕西、山西等省义赈……到1892年退出义赈队伍,历时十余年,这正是他从38岁到51岁阶段,是一生中年富力强之时,他把人生中黄金岁月献给了义赈事业。”

协赈公所是比较成熟的民间义赈机构,它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。1877年冬,经元善从报上获悉河南奇灾,与友人李麟策及上海果育堂首董瞿世仁商议,决定募捐救济豫灾,开办义赈。次年2月,又和李麟策及旅沪同乡绅商屠云峰等数人,创立“上海共济同人会”,专办豫赈。3月,瞿世仁病故,同人一致推举经元善代替果育堂负责收解赈款之事。4月,上海义赈绅商开会集议陕西义赈问题,又一致公推经元善“总司后路赈务”,全面负责赈款收解事务。经元善遂集全力于赈务,为着一志筹赈。“他毅然将世业仁元钱庄停歇,以其地办上海‘协赈公所’,作为组织上海绅商进行义赈活动的常设机构,从而使经元善在实际上成为上海绅商义赈活动的领袖,他在上海的社会地位也顿时提高。”协赈公会在当时的中国是应运而生,符合社会需要。它属于民间自设机构,由地方有威望的士绅领导一方民众进行义赈活动的方式,在全国属首倡。它的创办,使分散各地的义赈活动增强了组织性和计划性,有利于克服规模小、力量分散的弊端,使义赈规范化和制度化。对于受灾地区,协赈公所先派人去调查实情,对于受灾区域、受灾人数,灾情程度有确实了解后,“根据实际灾情确定赈济范围,募款、司帐、押运、放赈都有专人负责,每一灾区均按灾民人数和发放标准拨给款项,在地方官吏的配合下按规定发放。这种募、收、运、放相分离,定点、定人、定